

战略思维视角下中共中央转战陕北的历史启示

刘建军, 申灿

(中共河北省委党校(河北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 河北 石家庄 050031)

[摘要] 1947年,是具有转折意义的重要一年,国共在战场的优劣强弱对比逐步发生了有利于后者的巨大变化。而变化起始于围绕陕北延安的一攻一转的博弈之中。中共中央转战陕北是解放战争进程中一次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性转折。它推动解放战争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是战争形势发生重大转变的关键一招。中共中央无论是主动放弃延安、留在陕北还是转战陕北都充分体现了中共中央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深入研究中共中央转战陕北的历史及其启示,不仅有助于我们充分认识转战陕北的重大历史意义,而且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和把握战略思维的重要性。

[关键词] 中共中央;转战陕北;历史启示;战略思维

doi:10.3969/j.issn.1673-9477.2020.04.017

[中图分类号] K2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477(2020)04-087-05

在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受挫后,从1947年开始,蒋介石调整了战略部署,集中了近70万的兵力对山东和陕北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这样,陕北战场和山东战场就成为解放战争中两处较为重要的主战场。能否粉碎国民党的重点进攻,关乎着整个中国革命的成败。尤其是,在蒋介石看来,延安是中共的首都,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号施令的中枢,攻占延安,无疑将具有重大的宣传和象征意义。为此,蒋介石下决心要首先不惜一切代价占领延安,进而妄图消灭陕甘宁边区部队,或者压迫这支部队和中共中央首脑机关、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到黄河以东的华北解放区去。到时在华北与人民解放军进行决战,以达到将人民革命力量各个击破的目的。

1947年3月,胡宗南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大举进攻中共中央所在地陕北延安,使得中共中央再度面临着大规模转移。如何应对国民党对延安的疯狂进攻以及如何重新布局全国解放战场,成为中共中央急需解决的重大战略问题。纵观中共中央转战陕北进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科学的思维方法制定战略策略,不仅充分体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超的战争指挥能力,更展示出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灵活运用。

一、中共中央主动放弃延安体现了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

蒋介石将重点进攻陕北的任务交给了拥有重兵

的“西北王”胡宗南。1947年2月28日,蒋介石急电西安绥靖主任胡宗南去南京,表示将要进攻延安。1947年3月13日,胡宗南十五个旅十四万余人,分兵两路,向延安发动进攻。再加之马鸿逵、马步芳部和榆林邓宝珊部,全部兵力达34个旅约25万人。而在这个地区的中共部队只有2.6万余人,无论是在兵力上还是武器装备上,保卫延安的部队都很难与胡宗南的军队进行正面抵抗。面临着蒋介石和胡宗南对延安的重点进攻,中共中央坚毅地做出应对。毛泽东的回应是:“我是要最后撤离延安的。”^{[1](p175)} 3月18日,中共中央在王家坪毛泽东住处举行会议,商讨撤出延安和应对国民党作战问题。在这次会议上,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从全国战争的形势出发,根据陕甘宁边区的实际,作出了撤离延安的决定。并“要求对撤出延安问题做好干部、群众的思想工作”。^{[1](p175)} 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延安,在国内外都有较高的知名度,国民党如果占领延安将具有巨大的宣传和象征意义。蒋介石就在自己的日记中写到:收复延安“对政略、对外交,皆有最大意义也”。^{[2](p148)} 再加上中国共产党人对延安有很深的感情,撤离延安的决定不是很容易就能做出的。放弃延安不仅意味着中共中央再次被迫实施战略转移,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共产党苦心经营十多年的红色首府将陷入敌人之手。面临着军事和政治上的困境,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站在全局的高度,从全国战争形势和革命发展形势出发,以战略性思维向

[投稿日期] 2020-08-10

[基金项目] 河北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编号:HB19MK011)

[作者简介] 刘建军(1971-),男,河北高邑人,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河北历史文化。

广大党员和军事干部阐述了中共中央主动撤离延安的战略考量。“我军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1](p176)}毛泽东关于人地的辩证认识,充分体现了中共中央主动撤离延安的战略思想。1947年3月19日,中共中央又再次向全党指出:“我们若能将胡大部吸引在陕甘宁而加以打击消灭,这正便于其他解放区打击和消灭敌人,恢复失地。”^{[1](p176)}时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的师哲回忆道:“可否设法保住延安而不撤退。毛主席说:你的想法不高明,不高明。你知道吗?蒋介石占领了延安,他就以为自己胜利了,但实际上只要他一占领延安,他就输掉了一切。”^{[3](p621)}以小换大,以局部失利来换取全局的胜利,这一思想充分表明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撤离延安问题上高瞻远瞩的战略性思维。而最后的实事也正如毛泽东所讲,我们不仅收复了延安,同时也换取了全国的胜利。

依据中共中央保卫延安并适时放弃延安的决策部署,在延安保卫战实施6天6夜后,3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撤离延安。

二、中共中央留在陕北体现了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撤出延安后,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共中央向何处去。这不仅关系到整个战场的局势,而且直接决定着民主革命的发展。蒋介石和国民党高度关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去向,妄图将中共中央消灭在陕北亦或者赶过黄河。全党和解放区的军民也十分关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实际上,在作出撤离延安前,中共中央始终没有作出向何处去的决定。从现有资料看,中共中央关于是在陕北还是转向他处是存在分歧和争议的。

1947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在发给各地区负责人的电报中就指出:“以边区地域之广,地形之险,人民之好,有把握钳制胡军并逐渐削弱之,保持广大地区于我手,以利他区作战取得胜利。”^{[4](p113-114)}毛泽东在3月19日撤出延安前曾对王震讲道,我和你们一起坚持在陕北斗争,不打败胡宗南,决不过黄河。撤离之前,无论是中共中央还是毛泽东都表达了要留在陕北继续牵制胡宗南部的想法。与此同时,彭德怀等人却极其担心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安危,多次建议中共中央离开陕北,东渡黄河。随着胡宗南部进攻的深入,中共中央五位书记对是否留在陕北也有了不同意见。1947年3月20日,刘少奇、朱德

和任弼时在发给贺龙等人的电报中就明确表示中共中央要离开陕北的想法:“中央决定全部先后转移晋绥,请在辛关渡设置少数船只,以便紧急时渡河之用”。^{[5](p70)}这封电报表明中共中央有初步渡河进入晋绥的想法。此时毛泽东率领的一部分中央机关还在徐家沟,并没有前往王家坪。1947年3月21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转移到清涧县高家峪,在这里观察敌人占领延安后的动向。3月25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与朱德、刘少奇等人在王家坪会合。3月27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指出中央决定在陕北不走。同日,中共中央在发给贺龙、李井泉的报告中指出了中共中央留在陕北的原因:“中央率数百人在陕北不动,这里人民、地势均好,甚为安全。”^{[1](p177)}这就与3月20日刘少奇、朱德等人致电贺龙中共中央准备全部转移晋绥的电报有了出入。直到此时,中共中央向何处去依然没有最终的定论。

1947年3月28日在王家坪,中共中央作出了留在陕北的决定。但是到了3月29-30日的枣林沟会议上,在讨论中央机关行动去向的问题上,中共中央又发生了争论。任弼时“坚持要中共中央离开陕北,东渡黄河到较安全的地方”。^{[6](p14)}而毛泽东再次站在全局的视角,明确指出自己不能走,并要求党中央也最好不要走,从而达到拖住胡宗南为其他地方争取有利条件的目的。最终,中共中央同意了毛泽东的建议,决定继续留在陕北指挥作战。与此同时,中共中央站从战略全局的高度出发,出于对安全的考虑,决定对中共中央机关和五大书记进行分工。至此,中共中央机关一分为三,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率领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留在了陕北。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惊世骇俗的大胆决定和惊险之举,但又不是一个莽撞之举,而是一个集果敢、胆识和智慧于一体的空前壮举,是一个建立在非常清晰的形势认识和坚实的依据之上的理性判断和正确的战略决策。这是因为,从战略高度来看,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留在陕北都有着极端重要的意义。在政治上,党中央和毛泽东继续留在陕北会大大鼓舞在陕北和其他地区进行作战的军民士气,也向全国人民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气概,大大提高了共产党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在国际上也形成了一定的影响。1947年5月14日,在安塞县真武洞举行的庆祝大会上习仲勋公开讲道:“今天这个大会完全揭穿了两个月来敌人的造谣。他们说什么中共中央走了,西北局走了,边区政府也走了,这只是敌人的梦话。毛主席和中共中央仍然在边区领导者我们。我们有毛主

席和中共中央的领导,我们更加信心百倍,更加勇气百倍,一定把胡宗南军队消灭干净。”^{[7](p64)}在军事上,党中央和毛泽东留在陕北,将会大大牵制胡宗南的主力,减轻其他解放区的作战压力。国民党对陕北和山东两个解放区的进攻,就像打出去的两只拳头,只要能牵扯住两只拳头,使其难于往回收缩,国民党的中心区域就会裸露出来,这也就为之后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直插敌人心脏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胡宗南所率领的这支部队整体装备优良,在抗日战争时期并没有参与较大的对日作战,所以力量保存完整。由于蒋介石和胡宗南的攻击目标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一旦中共中央离开陕北,去往别的解放区,将会给其他解放区带来巨大的作战压力,甚至会对整个解放战场带来不可设想的后果。中共中央在1947年4月9日的通知上就明确指出:进攻延安和陕甘宁边区,还为着妄图首先解决西北问题,割断我党右臂,并且驱逐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出西北,然后调动兵力进攻华北,达到各个击破之目的。^{[8](p1221)}

三、中共中央“转战”陕北体现了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

中共中央枣林沟会议决定了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率领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继续留在陕北,但以何种形式留在陕北并没有明确的指导思想,留并不意味着转。中共中央如果想始终拖住胡宗南部,就必须在确保自己安全的前提下,始终保持对胡宗南部的吸引。蒋介石之所以命令胡宗南进攻延安,主要意图在于将中共中央“逐出西北,以便东进击破中原或华北战场之共军。”^{[2](p147)}因此,中共中央和解放军主力就成为胡宗南部寻找攻击的首要目标。对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有着清醒的认识,毛泽东为中央军委在1947年5月11日发给彭德怀、习仲勋等人的电报中就指出:胡宗南此次进攻,亦是企图将我驱之河东……胡军的目的完全不是所谓打通咸榆公路,而是驱我过河。^{[1](p189-190)}中央军委在胡宗南进攻延安之初就确定陕北解放军的作战方针是:“我军在陕北作战,目的是钳制胡宗南集团,实现这一目的的关键不在守住延安,而在于让敌人进入陕北后,无法脱身”。^{[9](p43)}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正是根据此目的,在陕北开始了艰苦而伟大的转战。“从1947年3月18日离开延安到1948年3月23日东渡黄河,毛泽东转战陕北历时1年零5天,行程1000多公里,途经12个县,驻留过38个村庄。”^{[10](p4)}可以说,这一年的时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始终保持着

“转”的状态,最长停留时间也仅仅为4个月。

陕北转战,是中共中央的又一次战略大转移,可以说是再次进行了一次长征。长征重在甩掉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而转战陕北则是中共中央要通过兜圈子来拖住国民党胡宗南部队。所以,要辗转行军,进行大迂回运动,在千山万壑中领着紧逼追击的国民党军队从一个沟壑转移到另一个沟壑。

转战陕北的条件极其艰苦,也极其危险,是异常艰苦和危险的一段行程。这是因为,陕北地区沟壑遍布,固然是大大增加了胡宗南寻找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难度,但是这样的地形地貌特点,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来说,也带来了极为不利的转战条件。他们也要在陕北无数山梁之间爬上爬下,睡野地,啃干粮。更为严重的是,转战路上,险象环生。转战陕北历时一年多,有时和国民党军队擦肩而过,有时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前后夹击,仅大的转移就有8次。有时,两军相距仅四五里路,有时仅隔一个山头。当时跟随中央转战的通信大队长黎东汉回忆转战陕北甚至比长征时还苦。虽然充满困难甚至极大的危险,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始终不改其策,在陕北钳制住了胡宗南部,采取“蘑菇”战术,使其始终难以发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位置,数万大军疲于奔命。

转战陕北使得胡宗南始终难以发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行踪,加之陕北榆林地区沟壑遍布,也大大增加了胡宗南寻找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难度。中共中央以800多人的小队伍始终将胡宗南的几十万大军拖在陕北,配合彭德怀的西北野战军将胡宗南的部队拖累拖瘦,分而歼之,为粉碎国民党蒋介石重点进攻和缓轻其他战场压力,从而由战略防御向战略进攻提供了有利条件。中共中央转战陕北虽然条件极其艰苦,中央也始终在移动过程中。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始终胸怀全局,站在全国革命形势新发展的高度,站在战争全局的高度制定决策,战略判断准确,谋划科学,使得中国共产党始终在军事中处于主动地位。

1948年3月,中共中央转战陕北的任务已经胜利完成,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迎接不久就要到来的全国范围的伟大胜利,中共中央决定到华北去和中央工委、中央后委会会合。毛泽东说:中央准备东渡黄河,自从蒋介石指挥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党中央在陕北转战已一年了。去年3月19日胡宗南占领了延安,可谓蒋介石最得意、最神气之时。蒋介石得意忘形,吹牛要在3个月或半年之间消灭中央首脑机关和西北野战军。经过一年的较量,全国各战区的斗争形势对我们越来越有利,我们在全

国范围由被动变为主动了。你蒋介石赶我们过黄河,我们偏不过,在陕北拉着你的队伍转圈子,一年后的今天,我看过黄河的时机到了。中央在适当时机与中央工委、后委会合,有利于指挥全国的战争。

3月21日,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离开杨家沟,到达绥德县的古镇。23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东渡黄河,进入山西临县,结束了在陕北的转战岁月。

四、启示

“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的事业就有希望”。^{[11](p9)}而战略思维,就是强调看问题、想事情要高瞻远瞩,统揽全局,不能陷入事务主义之中;要以小见大,见微知著,善于把握事物发展总体趋势和方向。其突出特点,就是前瞻性、全局性、根本性和长远性。中共中央转战陕北的历史,神奇而又惊人,就是一个着眼于从战略上赢得主动从而逆转了严峻形势的成功范例。

中共中央主动撤离延安和转战陕北的伟大决策启示我们,思考问题和制定决策要有战略思维和全局视角,要从全局把握局部,从长远把握当下。这就要求我们党员领导干部树立大局意识,善于把握大势,善于从大局和大势去考虑问题。战略思维要求我们无论做任何事情都要站得高、看得远、稳得住,所谓站的高,就是要站在党和国家发展的高度,站在国内和国外发展的高度,站在历史和未来的高度来思考问题;看得远,就是要有预见性,不能仅看到眼前的事物,要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能够看到纷繁复杂现象背后隐藏的本质关系,根据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做出的正确决策。稳得住,就是要在明确战略目标后,要有“泰山崩于前而不瞬,卒然临之而不惊”的战略定力,不能因一时困难,就放弃对目标的坚定。

(一) 清晰明确的目标

清晰明确的目标是中共中央转战陕北重要的历史启示之一。中共中央转战陕北的战略目的就是为了配合全国解放战场,实现由战略防御向战略反攻的转变。从主动撤离延安,到留在陕北再到转战陕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始终明确这一目标,面对着几十倍于己的敌军,面临着转战陕北的艰难困苦,始终保持战略清醒,聚焦目标制定决策。因此,清晰明确的目标是转战陕北能够成功的重要保障。这就要求我们在实际工作中,要有清晰明确的目标。战略目标不是凭空而定,而是在根据实际情

况,研判事物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制定的科学合理的战略目标,有了清晰明确的目标,才能统一思想,才能为着同一目标努力奋斗。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伟目标,这一战略目标的制定正是在深刻把握历史发展的潮流,准确研判我国发展实际的基础上制定的科学目标。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肩负起拯救中华民族的伟大重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紧紧围绕这一战略目标,推动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要紧紧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咬定青山不放松,以钉钉子的精神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二) 统筹协调的战略部署

中共中央在转战陕北期间发出的电报和指挥的战役全部是着眼于全国解放战场,包括陕北、山东、东北、山东、华中等地区的军事作战。正是有了中共中央统筹协调的战略部署,各地区紧密配合,才最终实现了转战陕北的预期目标。明确了战略目标,就要有统筹协调的战略部署。只有战略目标而无统筹协调的战略部署,那么工作就会一盘散沙,最终也难以达到预期的目标。战略部署就是根据战略目标统筹协调安排具体措施,每项措施之间要有协同性、关联性,每项措施都要共同推进、共同实施。党的十八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方位擘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标注了时间表,绘制了路线图。“五位一体”各方面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不可分割”;^{[13](p29)}“四个全面”内在逻辑紧密、相辅相成。同时,“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又是一个相互关联、协同推进的总体战略,是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总规划。面对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必须始终坚持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紧紧扭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个战略目标,为实现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贡献力量。

(三) 保持坚定的战略定力

战略定力是确保实现战略目标的重要基石,战略目标再明确,战略部署再全面,如果不能保持战略定力,就会竹篮打水一场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

确定转战陕北的战略目标后,始终紧紧围绕这一目标制定决策,无论是面临战争的危险还是各种偶然事故的危险,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都始终坚定不移,坚如磐石,最终确保转战陕北战略目标的实现。保持坚定的战略定力一方面需要对战略目标保持坚定的自信,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阻力和困难,都要始终相信目标的正确性和可实现性。另一方面,也需要有坚强的意志和毅力,实现目标的过程不会一帆风顺,轻轻松松,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在这一过程中,只有坚强的意志和毅力,才能确保我们始终不偏离战略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儿女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我们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为接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征程上,我们“还有许多雪山、草地需要跨越,还有许多娄山关、腊子口需要征服”。^{[12](p49)} 面对着来自国际和国内的众多挑战,我们要始终保持战略定力,“始终保持清醒坚定,保持强大前进定力,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真正做到“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13](p28)}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 [2]蒋永敬,刘维开.蒋介石与国共和战:1945-1949[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3.
- [3]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5:621.
-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4册)[M].北京: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
-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 [6]中共河北省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移驻西柏坡前后[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
- [7]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习仲勋文集(上)[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
- [8]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9]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战史[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5.
- [10]田建发、冯帆.中共中央转战陕北期间的安全保卫工作[J].党史博览,2019(6).
- [1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
- [12]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 [13]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

[责任编辑 王云江]

Historical enlightenment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s Transfer to Northern Shaanx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rategic thinking

LIU Jian-jun, SHEN Can

(Party School of Hebei Provincial Committee of C. P. C(Hebei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 Shijiazhuang 050031, China)

Abstract: The year of 1947 was an important year with a turning point. The contrast between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the Kuomintang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in the battlefield gradually changed. Great changes had taken place in favor of the latter. The change began in the game of "attack and turn" around Yan'an in Northern Shaanxi.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s was a significant and far-reaching strategic turn in the process of the war of liberation. It promoted the liberation war to a new height and was a key move of the war situation with great change. Whether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voluntarily abandoned Yan'an, stayed in Northern Shaanxi or moved to northern Shaanxi, it fully reflected the strategic thinking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 thorough study on the history and its enlightenment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s transition to northern Shaanxi can not only help us understand the great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war, but also help us understand and grasp the importance of strategic thinking.

Key Words: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transfer to northern Shaanxi; historical enlightenment; strategic thinking